

#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王永平

[摘 要]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载体。

[关键词] 十六国北朝 玄学 士风 学风 南士 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9) 11-0101-10

魏晋之际，玄学主要兴盛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西晋崩溃以后，随着中原士族阶层的南迁，玄学风气也随之南传。自东晋以来，建康便取代了昔日的洛阳，成为玄学清谈的中心地，玄学对东晋南朝的士风与学风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而在少数民族诸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玄学风气则难以延续，以致形成了南北学术文化风气的明显差异。对此，唐长孺先生曾指出：“正当所谓正始之音复闻于江左，即玄学清谈在江南风靡之时，北方玄学却几乎绝响，南北学风呈现出显著的差异。”<sup>[1](P212-213)]</sup>《隋书》卷 75《儒林传序》称：“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sup>①</sup>这里虽说的是南北经学风气的差异，但根源在于玄学风气的影响程度不同。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也一再论述魏晋以来清谈玄学与佛学的结合，然历经汉魏之间、两晋之际和南北朝之交叉学名僧的不断南渡，“自此以后，南北佛学，风气益形殊异。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此其原因，亦在乎叠次玄风之南趋也。”<sup>[2](P214)]</sup>至于南北文学艺术方面的差异及其与玄学之关系，曹道衡先生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等著作中也有深入的论述。可以说，玄学的存废盛衰，直接关乎南北朝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就十六国北朝而言，北方地区玄学“几乎绝响”，这确实已是无争的常识。不过，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文化现象虽然皆有兴衰，但绝不可能毫无遗存，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玄学风尚也大抵如此，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第 23 章《晋南北朝学术》之第 4 节《儒玄诸子学下》中根据相关零散的资料，

作者简介 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扬州，225002）。

① 其实，在东晋时代，人们已开始关注南北学风的差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不过，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5 年版）一文中以为，魏晋期间的南北地理界限与后来人们以江南、江北为界不同，而是以黄河为限，“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乃指大河以北流行的汉儒经学传注”；“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乃指大河以南流行的玄学”。对此，胡宝国先生在《两晋时期的“南人”与“北人”》（刊于《文史》2005 年第四辑）一文中，以为唐先生对当时南北地理界限的划定似不成立，应以江南、江北视之。所谓“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并非指玄学。

有论云：“魏晋世洛中人物，东渡已后，流风未沫。……余风又流衍于北。……入隋乃息。”有鉴于此，本文专题考述北朝时期的玄学文化风尚，不当之处，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 一、北魏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

所谓“北朝”，包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初，其间北方地区民族融合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北魏中后期以来，南北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断深入。在这一背景下，北方地区原有的玄学文化因子在不断萌发，而北方人士对南方文化的吸收，进一步刺激了玄学风尚的传播，从而多方面、深层次地影响到北朝文化的发展。

鲜卑上层统治者大约在魏晋之际开始接触到汉族文化，但对立与隔离的情绪颇为严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魏前期。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焘统治年间曾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汉化高潮。当时，拓跋焘在汉族士大夫代表人物崔浩等人的帮助下，大力起用汉族士人，其中从北凉入魏的诸多学者和南方晋宋更迭之际避难入魏的不少南士，都获得崔浩的提携和奖掖，《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载：“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力也。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于浩。”关于河西诸儒为崔浩拔用者，详见《魏书》卷52和《北史》卷34所载诸人列传，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已有详细的考述。至于南来人物，详见《魏书》卷38、《北史》卷27所载诸人列传，拙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北魏之南朝流亡士人与南北文化交流》已有细致考叙。河西与江南人士入魏，必然会带来包括玄学风尚在内的新文化因素，这是不难理解的。其中特别是河西人士几乎悉数迁徙平城，对于北魏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尤为突出。具体就北魏玄学而言，其滋生、繁衍皆肇端于此。

何以如此？这与河西学者所携之玄学文化因子相关。河西虽地处偏僻，但在西晋末为汉人大族张轨控制，因而成为中土人士的避难之所，张氏招揽儒士，使得河西成为汉、魏文化传统的重要保存地。《魏书》卷52《胡叟传》载时人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资治通鉴》卷123《宋纪五》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亦载“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对此，胡三省有注云：“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随着诸多学者流落河西，玄学风尚在凉州也有所保存和传播。及至北凉，其学术文化颇为发达。从相关记载看，北凉有玄学的遗存，其士风也有玄化的痕迹。关于北凉玄学，《魏书》卷60《程骏传》载：

（程）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乘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健擢为东宫侍讲。

程骏对儒者轻诋老、庄学说为“虚诞”，“意以为不然”，其师刘昞则加以表扬，说明刘昞也有相似的看法。刘昞为河西大儒，他的看法颇具影响力，可见北凉学术中确实保存着玄学思想的余绪。对此，陈寅恪先生有论云：

程骏与刘昞之言，乃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之论，此说为晋代清谈之焦点，王阮问答，所谓“将无同”三语，即实同之意，乃此问题之结论，而袁宏后汉纪之议论，多为此问题之详释也。自晋室南渡之后，过江名士尚能沿述西朝旧说，而中原旧壤久已不闻此论，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朝遗说之一证也。<sup>[3] (P44-45) ①</sup>

陈先生明言河西保存着中原旧壤已不复存在的玄学思想风尚。

---

①陈寅恪先生在《清谈与清谈误国》的讲演中，对此说得更为明确：“降至东晋末，清谈之风稍戢。惟北朝河西，仍存西晋遗风。盖由其地较为安全，故西晋名士之未能南渡者，多乐往归焉。”张为纲记录，原刊于《星岛日报》1949年1月26日，《陈寅恪文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51页。

进一步考察,可见其他北凉学者涉猎颇为驳杂,多具玄化色彩。据《魏书》卷52所载入魏北凉诸儒的情况,刘昉著作史书多部,“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指出:“刘昉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才、性问题正是正始玄学的关键问题之一。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卷。”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宋繇,“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常爽,《魏书》卷84《儒林列传》载其祖以来“因世乱遂居凉州。……(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侯,《五经》百家多所研综”。以上诸位虽以儒学为宗,但对“诸子群言,靡不览综”,自然会涉及玄学,刘昉对玄学的态度便很具代表性。又,《北史》卷34《索敞传》载其为敦煌人,“为刘延明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延明业。凉州平,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刘邴长于玄学,索敞既“尽传延明之业”,当然也当包括玄学思想。

此外,北凉人士的言行表现还透露玄化士风的色彩。如《魏书》卷52《胡叟传》载胡叟“世有冠冕,为西夏著姓”,他曾流落蜀地,又曾至江东,难免受到江南风尚的熏染,行为颇玄化。本传载“叟不治产业,常苦饥贫,然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牝牛,弊韦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饮噉醉饱,便盛余肉饼以付螟蛉。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在北魏,“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谓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其祭奠先人,仪式上也颇具个性,“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则泪下,若孺子之号。春秋当祭之前,则先求旨酒美膳,将其所知广宁常顺阳、冯翊田宗文、上谷侯法俊,携壶执榼,至郭外空静处,设坐奠拜,尽孝思之敬。”诸如此类,说明胡叟颇为任情率性。又如段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疏薄,有始无终”。所谓“性疏薄”,也就是率性纵情。北凉士人入魏,对鲜卑拓跋部的汉化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就玄学风尚而言,河西学者也是北朝玄学传承的一个环节。当时不仅鲜卑保守势力颇为强大,而且这次汉化改革的核心人物崔浩,其重用“外国远方名士”,主要在于取法保存于河西与江南的汉晋制度,以推动北魏国家典制的建设和完善,而对玄学清谈,他本人并不喜好。《魏书》卷35《崔浩传》便载其“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韦生所谓家人筐篋中物,可不扬于王庭也。’”因此,当时北魏还缺乏玄学流行的基本条件。

不过,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鲜卑上层统治者逐渐重视玄学风尚,《魏书·程骏传》载:“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可见北魏中期以后,玄学有所传播,河西学者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吕思勉在论及程骏这一作用时说:“是清谈之风,传播河西,又还归洛下也。”<sup>[4] (P1385)</sup><sup>①</sup>正是就此而言的。献文帝成为第一位崇尚玄学的北魏帝王。<sup>②</sup>孝文帝颇具学养,《魏书》卷7《高祖纪下》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孝文帝“善谈《老》、《庄》”,自然倾心玄学。又,东魏孝静帝也研读《庄子》等典籍。<sup>③</sup>

在这种汉化氛围中,鲜卑皇族上层集团不少人物在生活方式与言行气质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玄化色

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吕思勉先生所说“还归洛下”,应是“平城”。河西人物被迁平城,而孝文帝亲政后迁都洛阳,则是后来的事。因此,这里径称洛下,似不妥。

②《魏书》卷114《释老志》载:“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在《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程骏论《老》、《易》”条考证也谈及程骏与献文帝谈玄之事(第732页)。

③参见《北齐书》卷24《杜弼传》的相关记载。

彩。这在宣武帝、明帝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元彧，《魏书》卷18《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彧传》载：“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学虽无优劣，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沉雅。’时人为之语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彧姿制闲裕，吐发流靡，琅邪王诵有名人也，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河阴之变后，元彧南奔萧梁，萧衍“遣其舍人陈建孙迎接，并观彧为人。建孙还报，称彧风神闲俊。衍亦先闻名，深相器待，见彧于乐游园，因设宴乐”。又载：“彧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sup>①</sup>任城王元澄，《魏书》卷19《景穆十二王·任城王云传附澄传》载其“少而好学。……萧隳使庾荜来朝，荜见澄音韵道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元澄子元顺，“性謇谔，淡于荣利，好饮酒，解鼓琴，能长吟永叹，托咏虚室。”孝文诸子更为典型，如《魏书》卷22《孝文五王传》载京兆王元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清河王元怱，“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爱之。彭城王勰甚器异之，并曰：‘此儿风神外伟，黄中内润，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sup>②</sup>可见北魏中后期拓跋氏皇族汉化人物气质之变化。此外，其他鲜卑入洛汉化人物也有习玄者，如《周书》卷28《陆腾传》载陆腾为代人，其父陆旭，“性雅澹，好《老》、《易》纬候之学，撰《五星要诀》及《两仪真图》，颇得其指要。”陆腾通《易》及“纬候之学”，从其著述看，倾向于讖纬，这是北学的传统，不过，他同时习《老子》，当与玄学不无关系。

北魏后期玄化特征最突出的是由南入北的人物。这其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北魏前期入北南人的后代，一是北魏后期的北奔人物。就前者而言，如刁氏子孙，据《魏书》卷38《刁雍传》，刁雍在明元帝、太武帝之际入魏，“性宽柔，好尚文典，手不释书，明敏多智。凡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百有余篇。又泛施爱士，怡静寡欲。”其孙刁整，“解音律，轻财好施，交结名胜，声酒自娱。然贪而好色，为议者所贬。”又载“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所谓“门风不修”，显然是不符合北方礼法要求。同书又载王慧龙与刁雍大约同时入魏，其孙王遵业，“风仪清秀，涉历经史。……遵业有誉当时，与中书领陈郡袁翻、琅邪王诵并领黄门郎，号曰三哲。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而遵业从容恬素，若处丘园。尝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杨元慎也是这一类型的人物。《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条载：“世以学行著闻，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为时羁；乐山爱水，好游林泽。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玄理。性嗜酒，饮至一石，神不乱。常慷慨叹不得与阮籍同时生。不愿仕宦，为中散，常辞疾退闲，未尝修敬诸贵，亦不庆吊亲知。贵为交游，故时人弗识也。或有人慕其高义，投刺在门，元慎称疾高卧。”杨元慎处于魏宣武、明帝时期，是一个典型的玄化人物。考察其家族渊源，本为弘农人，晋冀州刺史杨峤六世孙，曾祖杨泰随宋武帝刘裕征关中，后入魏。因此，尽管杨元慎在北魏时自视为中原旧族，但实际上其家族具有南朝文化背景，孝文帝汉化之后，其玄学情趣得以张扬。可见北魏前期入北之南人，其家族内部始终蕴涵着玄学文化传统，至北魏后期明显地表现出来。

北魏中后期也间有南人入魏，就整体而言，对玄风北传的影响更为直接。如刘藻，《魏书》卷70《刘藻传》载其六世祖刘遐“从司马叡南渡。父宗之，刘裕庐江太守。藻涉猎群籍，美谈笑，喜与人交，

<sup>①</sup>《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条载临淮王元彧“博通典籍，辩慧清悟，风仪详审，容止可观。……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他常召集名士宴谈，“诗赋并陈，清言乍起”，其形式与内容皆颇玄化。

<sup>②</sup>《洛阳伽蓝记》卷4“冲觉寺”条载清河王元怱“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选隽民”。他常组织宾客、僚属进行诗文、谈论、音乐等活动，玄化色彩浓郁。

饮酒至一石不乱”。永安年间入魏。孝文帝时期入魏南人地位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肃，《魏书》卷63《王肃传》载王肃于太和十七年入魏，其“少而聪辩，涉猎经史”，“自谓《礼》、《易》为长”，为当时入北人物中门第最为显著者，“音韵雅畅”，孝文帝对其极为钦重，以之转输南朝礼仪制度和思想文化。宣武帝时，王肃弟秉又携其侄王诵、王翊、王衍等入魏，王诵“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肃宗崩，灵太后之立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音制抑扬，风神疏秀，百僚倾属，莫不叹美”。王翊“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王衍“名行器艺亚于诵”。

北魏之末，政局动荡，一些北魏人物一度南逃，后再回归北方，即所谓“出南入北”者，他们对沟通南北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作用，典型者如东平王元略。《洛阳伽蓝记》卷4“追光寺”条载元略“博洽群书，好道不倦”，其逃亡江东，梁武帝“见其器度宽雅，文学优赡，甚敬重之，……江左朝贵，侈于矜高，见略入朝，莫不惮其进止”。后元略返回北方，“从容闲雅，本自天资，出南入北，转复高迈，言论动止，朝野师模。”

北魏中后期北迁南人中有一支颇为特殊的群体，即南北交界地区的南朝军镇集团，其人物数量较多，在玄风北输中影响颇大，值得重视。如《魏书》卷71《裴叔业传》载其侄裴植“少而好学，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理义”。可见裴氏人物虽为南朝边将，但“善谈理义”，颇具玄学之才，其北奔入魏，大量幕僚随迁，如“时河东解人柳玄达，颇涉经史”，其子柳远“性粗疏无拘检，时人或谓之‘柳癫’。好弹琴，耽酒，时有文咏。……出帝初，除仪同开府参军事。放情琴酒之间。每出返，家人或问有何消息，答云：‘无所闻，纵闻亦不解。’”柳玄达侄柳谐，“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北地人梁祐，“从容有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天水阎庆胤，“博识洽闻，善于谈论，听其言说，不觉忘疲。”清河崔高客，“博学，善文札，美风流。”安定皇甫光，“美须髯，善言笑。”裴叔业幕僚玄化如此。此外，又有夏侯道迁集团，《魏书》卷71《夏侯道迁传》载，“道迁虽学不渊洽，而历览书史，闲习尺牍，札翰往还，甚有意理。好言宴，务口实，京师珍馐，罔不毕有。于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园池，殖列疏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妓妾十余，常自娱兴。国秩岁入三千余匹，专供酒饌，不营家产。每诵孔融诗曰：‘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余非吾事。’识者多之。”可见其生活方式颇为玄化。其子夏侯夬，“性好饮酒，居丧不戚，醇醪肥鲜，不离于口。沽买饮噉，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负数犹千余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饥寒。……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夬闻，谓（赵）卓曰：‘人生何常，唯当纵饮耳。’于是昏酣遂甚。……初夬与南人辛谡、庾道、江文遥等终日游聚，酣饮之际，恒相谓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后之间耳。脱有先亡者，当于良辰美景，灵前饮宴。倘或有知，庶共歆飨。’及夬亡后，三月上巳，诸人相率至夬灵前酌饮。时日晚天阴，室中微暗，咸见夬在坐，衣服形容不异平昔，时执杯酒，似若献酬，但无语耳。”这是一个典型的玄化集团，对当时玄学风尚的北传影响颇为显著。

由于北魏后期统治者的提倡和南士北徙，与其他典章文物制度及文学艺术不断北输的进程一致，玄学风尚也随之北传，并逐渐有所蔓延。这直接影响到了北方士人的思想性情、人生态度和学术观念，出现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北方本土玄士。《魏书》卷39《李宝传》载其先人为凉州李暠后代，李宝孙李神俊“意尚风流，情在推引人物”，“神俊风韵秀举，博学多闻，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笃好文雅，老而不辍，凡所交游，皆一时名士。汲引后生，为其光价，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检度，至于少年之徒，皆与褻狎，不能清正方重，识者以此为讥。”根据《北齐书》的相关记载，李神俊在北魏末和东魏时期，对诸多文义之士大力提携，如邢邵、魏收等，成为引领当时新士风的代表性人物。《魏书》卷47《卢玄传附卢元明传》载范阳卢元明“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采闲润，进退可观。……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论数十篇，文笔别有集录。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虽须《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范阳卢氏为北方儒学大族，其人物“性好玄

理”，风采可鉴，体现当时北方士风之变化。邢晏，《魏书》卷65《邢峦传》载其乃河间鄆人，其弟邢晏，“美风仪，博涉经史，善谈释老，雅好文咏”。高谦之，《魏书》卷77《高崇传》载其勃海蓟人，其子高谦之“及长，屏绝人事，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所该涉，日诵数千言，好文章，留心《老》、《易》”。其“留心《老》、《易》”，显然与玄学相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竟有世族妇女谈论玄理的情况，《北史》卷30《卢玄传附卢道虔传》载道虔“更聘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座讲《老子》。道虔从兄弟元明隔纱帷以听焉”。同时又载卢元明“性好玄理，作史子杂论数十篇”。<sup>①</sup>

由上所述，可见孝文帝迁洛之后，北魏之士风、学风之玄化进程明显加快，宣武帝、明帝时期，部分鲜卑上层与汉族大族子弟，其生活方式与文化情趣表现出鲜明的玄化色彩。对此，正如唐人苏世良所言：“自晋失纲纪，世道交丧，遗风余烈，扫地将尽，魏文迁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旧族，威仪式序，于是风流名士，往往间出。”<sup>[5] (卷755)</sup>

## 二、东魏—北齐之际的玄学与玄风

从北朝学术文化发展的总体过程看，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山东地区尽管一度遭受六镇鲜卑落后势力变乱的影响，学术文化风尚受到冲击，但毕竟这一地区是孝文帝以来的汉化中心，后来东魏迁都邺城，诸多魏末名士也北徙，延续着北魏中期以来的玄学新思潮，并将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无论是名士雅集谈论风气之浓郁，还是其论辩之理论水准，以及玄学与文学艺术之关联等，无不如此。《北齐书·杜弼传》载高欢之言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说明东魏士人崇尚江南文化的普遍心理。《魏书》卷84《儒林·卢景裕传》载高欢“闻景裕经明行著，……使教诸子。……景裕风仪言行，雅见嗟赏。先是景裕注《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其《毛诗》、《春秋左氏》未讫。齐王襄王入相，于第开讲，招延时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咸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彩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卢元明注《周易》、《老子》等，且“义理精微，吐发闲雅”，显然与玄学相关。<sup>②</sup>唐长孺先生研究北朝末南学北流风气时指出，“在魏齐之间像南朝那样以经师而兼涉玄释的也不乏其人”，他以为卢景裕“为当世硕儒，值得一提的是他除儒经以外还注《老子》，并通佛经大义。他为多种儒经作注，而非为旧注作义疏，有异于河北偏重郑注之风。所注《周易》却‘大行于世’，这里是否表明北方学风转变的迹象呢？”<sup>[1] (P235-236)</sup>

特别是杜弼，《北齐书》卷24《杜弼传》载其“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进奉东魏静帝和高欢父子；又载其“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可见其玄学理论修养甚高。他尤其重视玄、佛合一，东魏静帝对其说：“朕始读《庄子》，便值奏名，定是体道得真，玄同齐物。闻卿精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杜弼以为“佛性、法性，止是一理”，并对此进行深入论述。这种玄、佛合一的理论及其论证，显然是受到南朝玄化佛性学说的结果。武平六年，魏静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缙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可见东魏之玄学风气与玄佛合流之思想状况。不仅如此，杜弼还常与其他玄学人士论辩，本传载其“尝与邢邵扈从东山，共论名理”，邢邵以为“人死还

<sup>①</sup>北魏时期，特别是后期的一些隐逸之士，其生活方式与学术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学影响。如《魏书》卷90《逸士·李谧传》载其“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歌曰：‘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儿。生乎意不惬，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乐，终不为人移。脱寻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同书《郑修传》载其“少隐于岐南几谷中，……雅好经史，专意玄门”。

<sup>②</sup>《洛阳伽蓝记》卷1“景宁寺”条载：“（卢）景裕，范阳人也。性爱恬静，丘园放逸，学极六经，说通百氏。普泰初，起家为国子博士，虽在朱门，以注述为事。注《周易》行于世也。”

生，恐为蛇画足”。杜弼以为，“盖谓人死归无，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无也，无而能有，不以为疑。因前生后，何独致怪？”二人对人之生死的具体看法，这里不作评论，但他们反复论辩，“前后往复再三，邢邵理屈而止”，其思想方法与思想趣味无疑是玄学影响的结果。<sup>①</sup>唐长孺先生曾指出：“杜弼之深明佛义，当与他精通玄学义理相关。总之，杜弼学术深受南朝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杜弼是北朝仅见的玄学家，并非经师。”<sup>[1] (P235)</sup>邢邵也以清谈析理著名。《北齐书》卷36载其为河间郑人，“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他与河东裴伯茂、北海王昕等玄化人物组成一个名士交游群体。<sup>②</sup>邢邵是魏末以来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之士之一，与魏收、温子升同称“北地三才”。本传称“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其生活方式也颇自然，“虽望实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略简易，不修威仪，车服用，充事而已。有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饵之属，或置之梁上，宾至，下而共噉。天姿质素，特安异同，士无贤愚，皆能顾接，对客或解衣觅虱，且与剧谈。……性好谈赏，不能闲独，公事归休，恒须宾客自伴。”他与杜弼辨析义理，可见其不仅长于文学，而且精于玄谈义理。

东魏、北齐之际，王昕是名士集团的重要领袖人物。《北齐书》卷31《王昕传》载其“雅好清言，词无浅俗”。自北魏末以来，为逃避洛阳等地的动乱，他与邢邵、李浑、杨愔等人游逸、隐居于嵩山等地，特别是他出任东莱太守，邢邵等人随之隐居，组成一个文义交游群体。其弟王晞也为风流名士，“遨游巩、洛，悦其山水，与范阳卢思明、巨鹿魏季景结侣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终焉之志。”特别需要指出，王昕作为当时北人雅集之领袖人物，他极力摹仿南朝文化，《北史》卷24《王宪传附王昕传》载齐文宣帝“以昕疏诞”，下诏斥之，其中说他“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所谓“宾郎”，即槟榔。吃槟榔，这是南人的习惯。在文学方面，王昕好“好咏轻薄之篇”，这也是南朝的文学风尚，他“自谓模拟伧楚”，就是效仿南人。前引苏世良《王昕及弟晞传论》便将王昕兄弟作为当时玄化名士的代表。

此外，魏末、北齐之间还有几位著名的玄化人物。崔伯谦，《北史》卷32《崔鉴传》载博陵安平人崔伯谦“少时读经、史，晚年好《老》、《庄》，容止俨然无愠色，亲宾至，则置酒相娱，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为仪表”。羊烈，《北齐书》卷43《羊烈传》载：“羊烈，字信卿，太山巨平人也。……好读书，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北史》卷24《崔暹传》载清河崔贍“性方重，好读书，酒后清言，闻者莫不倾耳。自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醞籍者潦倒，而贍终不改焉”。崔贍容貌“洁白，美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发，才学风流为后来之秀”。崔贍如此，与其直接接受南朝学术文化熏陶不无关系，“初，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贍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以致魏末名士领袖李神俊赏爱有加。《隋书》卷77《隐逸·李士谦传》载其赵郡平棘人，其虽入隋，但学术思想无疑于齐发端。他信佛教、通儒学诸子，“士谦善谈玄理”，针对有人“不信佛家应报之义，以为外典无闻”的看法，深入辨析。同书同传又载博陵安平人崔廓，“与赵郡李士谦为忘言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廓尝著论，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文多不载。”其子崔躋入隋后，“与洛阳元善、河东柳、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邪诸葛颖、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

---

①林茂桂《南北朝新语》卷2“玄解”有三条录杜弼与魏孝静帝、邢邵等谈论佛法、佛性、生死等玄理，詹子忠分别评曰：“大是见性语”、“参透玄关”、“明道”，詹氏所评深明杜弼之玄理。

②关于裴伯茂，《魏书》卷85《文苑·裴伯茂传》载“伯茂好饮酒，颇涉疏傲，久不徙官，曾为《豁情赋》，其序略曰：‘……故复究览庄生，具体齐物，物我两忘，是非俱遣，斯人之达，吾所师也。故作是赋，所以托名豁情，寄之风谣矣。’……伯茂末年剧饮不已，乃至伤性，多所愆失。……卒后，殁于家园，友人常景、李浑、王元景、卢元明、魏季景、李骞等十许人于墓傍置酒设祭，哀哭涕泣，一饮一醉曰：‘裴中书魂而有灵，知吾曹也。’乃各赋诗一篇。李骞以魏收亦与之友，寄以示收。收时在晋阳，乃同其作，论叙伯茂，其十字云：‘临风想玄度，对酒思公荣。’时人以伯茂性侮傲，谓收诗颇得事实。”北魏末及东魏—北齐山东人士之群体交游，这一形式显然是南朝士族雅集方式影响的结果。

从相关材料看，东魏—北齐时代，北方人士已形成了一种流行的聚会与谈玄的方式。《北齐书》卷43《许惇传》载其“虽久处朝行，历官清显，与邢邵、魏收、阳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诸人或谈说经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惇不解剧谈，又无学术，或竟坐杜口，或隐几而睡，深为胜流所轻”。以上数例，主要是北魏末和东魏—北齐之交的情况，随着北齐称制，鲜卑遗风颇盛，玄化风气有所减弱，《北齐书》卷42《卢潜传》载卢昌衡“沉靖有才识，风仪蕴藉，容止可观。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顿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泰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太原王修并为后进风流之士”。可见天保以后，北齐玄学风气“自兹以后，此道顿微”。

论及东魏—北齐之玄学风尚，必须注意南学北传问题。一是北迁南士的转输作用。如诸葛颖，《隋书》卷76《文学传》载其为丹阳建康人，“侯景之乱，奔齐，待诏文林馆”，对《周易》、《庄》、《老》等皆有研习，“颇得其要”。又如徐之才，《北齐书》卷33本传载其为丹阳人，在梁朝曾从周捨习《老子》，为太学生，“粗通《礼》、《易》”，魏末入北，“聪辩强识，有兼人之敏，尤好剧谈体语，公私言聚，多相嘲戏”。由梁入齐的南士当然不止这二位，其他萧氏子弟及文士也当如此。其二是北士之主动汲取南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东魏—北齐文学的情况获得启发。当时邢邵与魏收争胜，《北齐书》卷37《魏收传》：“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可见当时北方文学之士正处于模拟江南文学的阶段，至于玄学风尚，作为文学之思想背景，自然也成为北人模拟与追求的对象。

总之，以上所述北魏之末和东魏—北齐之际山东地区之玄学风尚，是北魏中后期南学北输及北方士风与学风演化的必然结果。北魏中期孝文帝以来的汉化中心在洛阳，山东地区为北方文化发达之所在，此后东魏—北齐统治中心虽迁徙至邺城，但在文化上则继承了北魏以来的传统，不断推动南学北传与南北文化融合的进程，其玄风盛行则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对此，诚如李源澄先生在《魏末北齐之清谈名理》一文中所指出：“魏代自孝文而后，其风气日与南朝接近，经学佛学既有改变，文学尤盛，玄学亦渐兴起，而北来之南人尤为北士所慕。”当时南人入北、南学北传，“故自北魏末年下逮北齐，士大夫之学术与生活态度，皆以模仿南人位事。南朝老庄之学，以影响于人生态度者为巨，造成六朝之风流人物，《魏书·孝文本纪》谓孝文善谈老庄尤精美，孝文以后，文雅大盛，学者对于老庄之态度已不如前，故六朝士大夫之风染化于北方，音制风度，清言名理，为世所重。”随着这一风气的传播，“故北魏末年以逮北齐为北人南化极盛之时代，以清谈名理者，则有王昕兄弟。”<sup>[6] (P137-139)</sup> 因此，可以说由于当时南风北播，逐渐蔚然成风，清谈名理已成为时代之新风尚。

### 三、西魏—北周时期之玄学风尚

与东魏—北齐相比，西魏—北周所控制的关中地区自北魏以来在文化上显得封闭和落后，特别在孝文帝定都洛阳之后，关东地区成为北方汲取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学术文化与思想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而关中则处于沉寂状态。西魏时期，关中地区代表性人物对孝文帝以来的新文化思潮颇为轻视与抵制。以文学风尚而言，《周书》卷23《苏绰传》载：“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可见宇文泰对魏晋以来文风的态度。宇文泰的这一主张实际上主要体现了关中汉族人士苏绰等人的态度。《周书》卷22《柳庆传》载：“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这里将“江左”与“洛阳”对应，指出北魏中后期取法南朝。苏绰一再议论文章风格，实际上对文风背后“华靡”、“轻薄”的指导思想不满，也就是对玄学风尚的排斥。因此，总体说来，西魏—北周上层更提倡尚质朴素的文化观念。

直到北周中期以后，其文化政策便逐步调整，趋于变化，<sup>①</sup> 关中地区的玄学文化风尚始渐衍生、蔓延，特别是一些具有南朝文化背景的入关人士表现出玄化的特征。如《周书》卷 36《崔彦穆传》载其为清河东武城人，祖崔蔚“遭从兄司徒（崔）浩之难，南奔江左”，仕于刘宋，后返魏。北周明帝时，崔彦穆曾受命一再出使陈朝，“彦穆风韵闲旷，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谈谑，甚为江陵所称”。<sup>②</sup> 崔彦穆“善玄言”，与其祖辈之南朝背景不无关系。西魏灭梁元帝，征江陵人士入关，此后间有南士入关，他们也或多或少地传播了玄学风尚。《隋书》卷 58《明克让传》载其平原人，父为梁侍中，“克让少好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在梁时，“舍人朱异在仪贤堂讲《老子》，克让预焉。”可见其具有一定的玄学修养。又，何妥，《隋书》卷 75《儒林·何妥传》载其在梁时，“八岁游国子学”，后为梁元帝“诵书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著有《周易讲疏》13 卷、《庄子义疏》4 卷、《孝经义疏》3 卷等。元善，《隋书·儒林·元善传》载其父在魏时奔梁，“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五经，尤明《左氏传》”；侯景乱后入周，“风流酝藉，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具有名士风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入关之南士虽颇多坎坷，但他们在长安还保持着聚集的形式。《隋书》卷 78《艺术·庾季才传》载庾季才在梁灭后入关，“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绾、河东裴政及宗人（庾）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霁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可见北周时期南士聚集，“为文酒之会”，是南朝名士谈论形式的延续。

此外，还有自洛阳入关的北魏玄化学者。《周书·儒林·卢光传》载卢光为范阳人，卢辩之弟，“性温谨，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撰有《道德经章句》。又云“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唐长孺先生以为其“兼涉玄释与景裕同。范阳卢氏自汉末卢植以来，世传经学，景裕兄弟都以经学著称，但从景裕、景仁的治学道路上可以看到接受南朝学风的迹象”。<sup>[1] (P236)</sup> 又，《隋书》卷 46《张弔传》载其父张羨，河间郑人，“少好学，多所通涉，……从武帝入关，……周代公卿，类多武将，唯羨以素业自通，甚为当时所重。……撰《老子》、《庄子》义，名曰《道言》，52 篇。”张弔好学，有父风。《隋书》卷 51《长孙览传附从子炽传》载：“炽性敏慧，美姿仪，颇涉群书，兼长武艺。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炽应其选，与英俊并游，通涉弥博。”北周武帝“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说明其对玄学风尚的包容性明显增强了，“周初粗犷之风，至此亦稍变矣”。<sup>[4] (P1386)</sup> 以上诸人后多入隋，其学风在隋代有所延续。吕思勉曾指出：“北方谈玄之风，至周、齐而少衰，然迄未尝绝也。”<sup>[4] (P1386)</sup>

#### 四、结语

北朝时期，北方玄学思想文化风尚虽远不及东晋南朝地区盛行，对儒家经学、佛教、道教思想及文学艺术的渗透和影响自然也不如江东地区显著，从而形成了当时“南学”与“北学”的明显差异。十六国河西地区自晋末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不少中土人士流寓于此，也保存了一定的玄学文化因子，在前凉、北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北魏灭凉，这些河西学者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到

---

<sup>①</sup>就文学艺术而言，大体至周明帝后，北周上层便开始趋于“南朝化”。《周书》卷 41《王褒传》载：“世宗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庾信传》载：“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周书》卷 47《艺术·赵文深传》载其为关中书家，“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在经学上，周武帝时一再征后梁大儒沈重至长安，《周书》卷 45《儒林·沈重传》载“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靡不毕综”。天和中，武帝曾命其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招集朝士、儒生、僧、道等 2000 多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沈重为江南大儒，所学非止《六经》，而是释、道兼宗，武帝以其讲学，并教育皇太子，表现出对南学的兴趣。

<sup>②</sup>这里所谓“江陵”，中华书局本《周书》校勘记指出《北史》、《册府元龟》等皆载为“江表”，“按彦穆乃出使于陈，作‘表’是”。

北魏学风的演进。北魏中后期以来,随着其统治者大力推进汉化变革,着力引进南方学术文化,使得以洛阳为中心地的关东地区成为南北学术交融和各种新学术思潮的流行地域,士风与学风出现了明显的“南朝化”倾向,而这种所谓“南朝化”,从其思想文化内涵上说,实际上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玄化”,这在北魏之末和东魏—北齐之际达到了高潮。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十六国北朝之玄学状况也体现出当时入主中土之少数民族统治者及其政权的汉化进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玄学风尚之不绝如缕,固然与北方固有玄学文化因子的留存相关,这以河西地区的玄学传承最为典型。不过,通过以上仔细考察当时北方玄学发展的基本进程,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北方地区的每一玄风盛行阶段,总是与南士北迁与南学北输密切相关。南、北朝之间虽然处于长时间的对立状态,但其间并非毫无联系,在军事对抗与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南北之间依然存在着思想文化的互动与交流,甚至在某些时段或地区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还出现了高潮。如北魏后期和东魏、北齐之际的关东地区,这种南北朝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是南风北渐、南学北输,直接推动这一趋势的因素主要在于南士北徙。士人是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士人的流动必然造成学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南朝士人的北徙总是促进着各历史时段江南学术文化的北传,其中玄化士风与学风之影响最为深刻,值得重视。对北朝后期士人风貌的变化,从梁武帝的看法可以大体得出结论。《北史》卷43《李崇传附李谐传》载天平中,东魏使节李谐、卢元明等人至建康,梁武帝以朱异接待,“异言谐、元明之美”,梁武帝亲自接见,“谐等见,及出,梁武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劲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谓异曰:“过卿所谈。”可见北方玄化名士的风采已与南人颇为接近。

尽管北朝玄学风尚并未完全中断,但与南朝相比,北方地区之玄学无法成为主流学术文化风尚,其对北朝士风与学风的影响总体上比较微弱,这使得北朝的经学、文学等风尚与南朝显然不同。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魏书》卷84《儒林·李业兴传》所载,李业兴为北魏儒者,“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天平四年,其随北魏使团至梁,与梁武帝、朱异等讨论儒家礼制、经术方面问题,梁武帝曰:“闻卿善于经义,儒、玄之中何所通达?”李业兴答曰:“少为书生,止读五典,至于深义,不辨通释。”梁武帝又问曰:“《易》曰太极,是有无?”李业兴对曰:“所传太极是有,素不玄学,何敢辄酬。”所谓“儒、玄之中何所通达”,就是如何会通玄学与儒学。李业兴自称“素不玄学”,无法就此展开论述。北朝经学风尚玄化的地区主要局限于青齐地区,《魏书·儒林传序》中载:“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也载:“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师训盖寡。”这就是说,河南(包括青、齐)地区在经学方面流行魏晋新经注,而与河北地区盛行郑玄的经注不同,在学风上接近南朝。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中将此称为“北学折入于南者”,原因则在于青、齐诸地在南北朝之初,一度为刘宋之控制的范围,南朝学风在此传播,因而出现这一地区经学玄化的情况。不过,在总体上,北朝儒者“素不玄学”,因而对于儒、玄自然“不辨通释”。

#### [参考文献]

- [1]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 [2]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4]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5] 苏世良. 王昶及王晞传论 [A]. 李昉等编. 文苑英华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6] 李源澄. 魏末北齐之清谈名理 [A]. 李源澄学术论著初编 [C]. 成都: 路明书店, 1944.

责任编辑: 杨向艳